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rcelain on Inspection
Paste, glaze, Paint, and Mould-making



民国瓷器鉴定

胎釉
彩绘
器型

老古董丛书

民国瓷器鉴定

胎釉 彩绘 器型

铁源 溪明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燕
责任校对：刘丽颖
装帧设计：羚 羊
摄 影：赵可明
 王 洋
 杨 婉
 良 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瓷器鉴定：胎釉彩绘器型 / 铁源编著. —北京：
华龄出版社，2003
ISBN 7-80178-137-6

I.民… II.铁… III.瓷器（考古）—鉴定—中国—
民国 IV.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766 号

民国瓷器鉴定

—胎釉 彩绘 器型

铁源 溪明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北京市鼓楼西大街41号）

印 刷：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9 × 1194 毫米 1/16

字 数：260 千字 图片：569 幅

印 张：20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78-137-6/K·24

定 价：268.00 元

内容提要

《民国瓷器鉴定》为国内外民国瓷器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分两卷：第一卷为《民国瓷器鉴定——胎釉、彩绘、器型》，第二卷为《民国瓷器鉴定——纹饰、款识、辨伪》。

本卷包括民国瓷器史略、胎质、釉色、彩绘、造型五部分。该书选用了550余幅精美的图片，多为民国时期的精品，且较少出版发表。史略部分以数十幅极难一见的老照片详细阐述了民国瓷业生产的全部过程及与之相关的各行各业的“瓷文化”现象。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据，还民国瓷业的真实面貌。举凡与民国瓷器有关的历史、宗教、民俗、典章制度、教育、经济、文学戏曲及科技等均有涉及，具有多学科的性质。特别是对鲜为人知的蒋介石祝寿瓷、国府礼宾瓷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民国瓷器研究史上的空白，使读者一睹民国“官窑”瓷器风采。胎釉部分详述了各种原材料的配方及不同器物的鉴定要点。彩绘部分不仅有各种彩料的呈色机理及配方，而且有读者迫切希望了解的彩绘比照分析、彩绘技法的介绍，使读者仿佛亲睹艺人绘瓷。造型部分求全求精，既有传统器型，也有民国创新器型，特别是对成型工艺的介绍较为详尽，大到瓶、缸，小到碗、碟及瓷塑，如若读者亲手拉制，镶嵌成型，跳出了一般瓷器书籍对器物尺寸、口底及腹耳等泛泛而谈的窠臼，实用性之强堪称独步。

目 录

民国瓷业史略.....	1
一 风光不再的御窑厂与独领风骚近 20年的官僚资本企业.....	2
二 不得天时，半途而废的民族资产阶 级瓷业改良.....	6
三 三足鼎立的徽、都、杂帮与轮流坐 庄的商会.....	8
四 独具特色、分工明确的制瓷原料业.....	12
五 五花八门的瓷器成型业与行规.....	16
六 掌握瓷器命脉的烧窑业.....	20
七 专营瓷器彩绘业的红店与破碗公司.....	25
八 门类齐全不可或缺的制瓷服务业.....	29
九 器成天下走的销售业与陈规陋习.....	37
十 职业学校的建立与瓷业人才的培养.....	45
十一 热心实业、力图改良的学术团体 与珠山八友“月圆会”.....	50
十二 扑朔迷离的袁世凯瓷与鲜为人知 的蒋介石瓷.....	55
民国瓷器坯胎.....	68
一 坯料.....	69
二 成型.....	71
三 胎质.....	75
民国瓷器釉色.....	77
一 白釉.....	79
二 红釉.....	80
三 青釉.....	82
四 绿釉.....	83
五 蓝釉.....	84
六 酱釉.....	85
七 黑釉.....	86

八	黄釉.....	87
九	窑变釉.....	88
民国瓷器彩绘.....		89
一	青花.....	90
二	釉里红.....	93
三	窑彩.....	94
四	古彩.....	95
五	粉彩.....	97
六	新彩.....	99
七	金彩.....	100
八	浅绛彩.....	101
九	贴花、刷花与喷花.....	102
民国瓷器造型.....		103
一	瓶.....	108
二	罐.....	172
三	碗.....	182
四	盘.....	190
五	酒杯.....	198
六	壶.....	202
七	盒.....	214
八	盖缸.....	219
九	花盆.....	220
十	缸.....	224
十一	文房用具.....	226
十二	香炉.....	238
十三	灯具.....	241
十四	花插.....	244
十五	牙签筒.....	245
十六	酒簋.....	246
十七	火锅.....	247
十八	帽筒.....	248
十九	烟具.....	249
二十	瓷塑.....	250
二十一	瓷板.....	283

民国瓷业史略

民国（1912—1949年）瓷器是中华民族4000年（从商代出现的原始青瓷算起）制瓷史中的重要一环，没有这一环节，瓷器发展史就是不全面的，没有这一环节，新中国瓷器的发展就无法与历史链接。但遗憾的是，陶瓷方面的有关著作在提及民国瓷业生产时多语焉不详，就连洋洋50余万字的中国陶瓷巨著《中国陶瓷史》在提及民国瓷业时，也仅用了20世纪上半叶，“瓷业衰败”四字来概括。诚然，民国时期，上层腐败，外敌入侵，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但这并不能证明陶瓷就必然衰败。简单的“衰败”，不符合陶瓷发展史上的艺术规律。以清代瓷器为例，清康熙乾隆三朝是瓷业生产的顶峰，清中期开始走向下坡，但这中间有一个过程，那就是嘉庆早期的瓷器仍有清盛世乾隆的风格，而不是一下就从峰顶跌入谷底。晚清瓷器生产每况愈下也是事实，但光绪时颇有中兴的趋势，而宣统瓷器就“各类官窑来说，其制作可谓少而精，瓷质优良，胎薄体轻，器型规严，绘工精细”。“虽然数量和品种较少，但制作水平并不低于先朝，工艺技法还有所提高”。尽管清王朝已经山穷水尽，濒临灭亡，但由于景德镇天然瓷土优良，生产的瓷器质地仍然很细腻，加上千百年来工艺积累的深厚基础，艺术上虽无创新，但瓷器成型仍然相当规整。仅短短三年的宣统朝瓷器人们便给了如此多的溢美之词，而清“官窑良工四散”，在民国仍从事瓷业生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是晚清瓷器的生产者，也

是民国瓷器的生产者，怎么会一夜之间随着统治者的江山易手，连自己生存的手艺都荡然无存了呢？严格来讲，艺术品尤其工艺品，有它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受政治约束较少，特别是它的艺术成就是附着在器物本身上的，政治对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诚然，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频繁，景德镇屡遭打击，瓷器生产一度达到了历史的低谷，瓷器的造型因循守旧，但是绝对不能就此认为民国瓷器没有发展，甚至是无可称道。

公允地说，民国时期对中国陶瓷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它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美术艺术和教育三个方面。从科学技术上看，民国时期瓷器的胎、釉、颜料和烧造技术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从美术艺术上看，文人派绘瓷艺术家以瓷代纸，将传统的瓷器由晚清的没落中拯救出来，使之重又成为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门类。从教育方面讲，民国时期先后成立的职业学校，打破了历代艺人私下相授、子承父业的樊篱，引进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这是以前历代都没有做到的。仅此一项，民国瓷业就功不可没。请注意，这里使用的“瓷业”而非“瓷器”，因为瓷器难免有单纯器物之感，会流入一般意义上的就瓷论瓷的俗套之中。而瓷业是就整个行业而言，凡是与瓷器生产有关的诸多方面均包括在内。为了最大限度真实还原民国瓷业的本来面目，本文分以下几部分加以详述：

一 风光不再的御窑厂与独领风骚 近 20 年的官僚资本企业

20 世纪初期，清王朝已步入了风烛残年，作为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御窑厂也风光不再。据史料记载，景德镇御窑厂在清代鼎盛时期厂址从龙珠阁延伸到现在的市政府，占地数十亩，中后段为宫殿式的主厂房，富丽堂皇。两侧为平房，中间为青石平铺的走道。头门之外，有形如龙舌的一方照壁，照壁之前竖有旗杆一对。主厂两侧各有甬道一条，各开一圆门，曰东辕门、西辕门。东辕门临中华路直往东门头、莲花塘；西辕门出东司岭，穿毕家弄

到中山路。最前为头门，东西两侧各置一石鼓，进头门东面有关帝庙和佑陶灵祠。再进为二门，二门之上题有“仪门”二字。二门两侧有吹鼓亭，每日早中晚，鼓乐齐鸣，悠扬成韵，员工鱼贯进厂，依次点名。御窑厂挑坯过街极为郑重，扁担上插有杏黄小龙旗，行人遇见惟恐避之不及，如若撞碰坯胎，不但要赔礼道歉，还要上茶楼酒馆，吃泡茶、蒸肉饭，花费银元三五元至二三十元不等，可谓风光一时。辛亥革命后，御窑厂随着皇权的失落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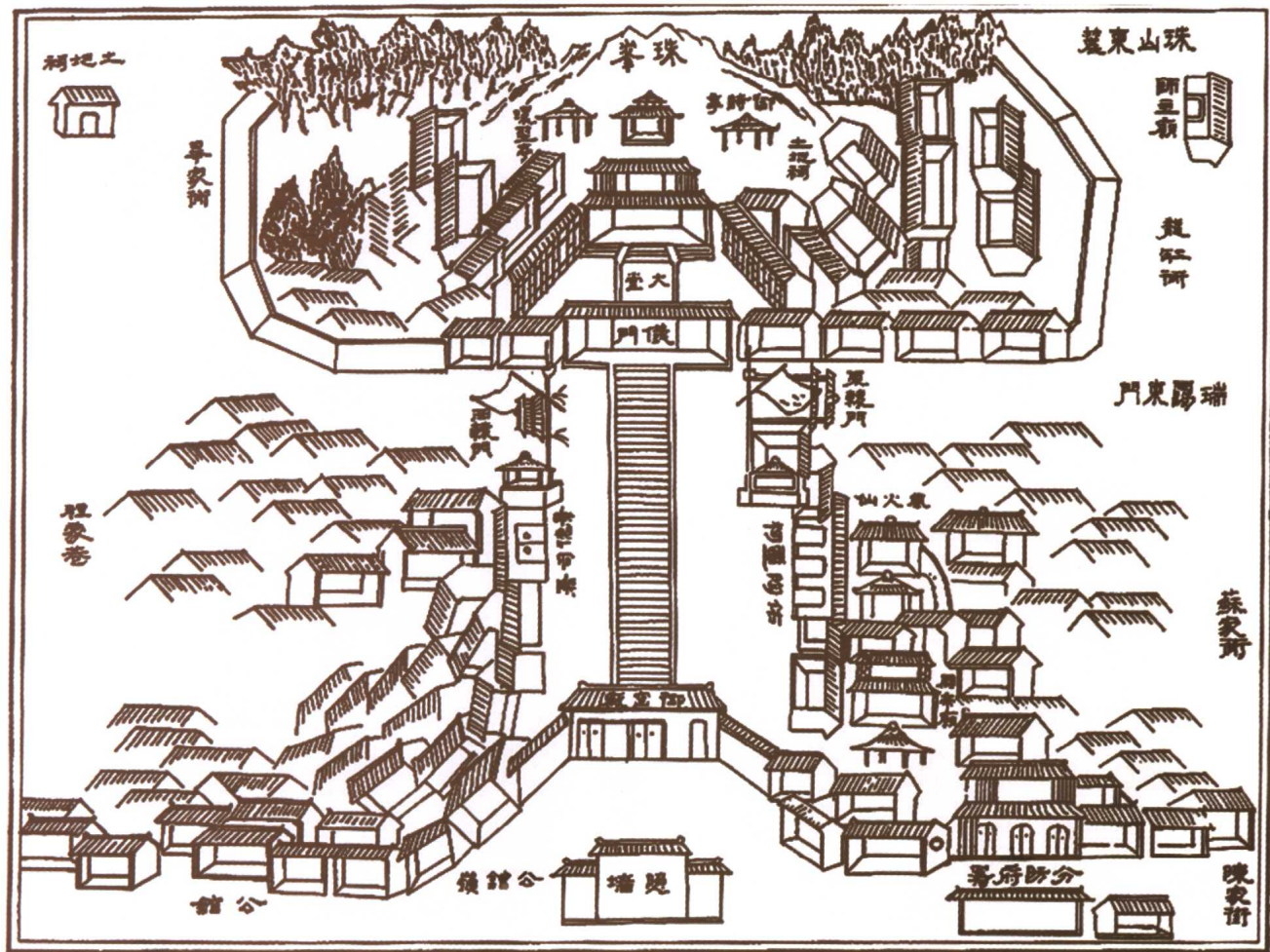


图 1 清代御窑厂图

設理江西巡撫布政使臣柯逢時跪
奏為開辦景德鎮瓷器公司派員經理以振工藝
而保利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浮梁縣之景德鎮製造瓷器已歷數
朝曩年售價約值五百萬金近乃愈趨愈下歲
不及半論者以為製法不精稅釐太重之故臣
初亦信以為然自來豫章悉心考察乃知此項
製作實勝列邦其選料也則合數處之土以成
坯故其質堅而其聲清越其上釉也則取各省
之物而配色故其光澤而其彩鮮明又復講求
火候考驗天時備極精微遂成絕藝其創始者
實深通化學之理至今分門授受各不相師非
若他技之淺而易明也始由朝鮮學製漸達於
東西各洋詎為瓊寶經營仿造乃克有成較之
華瓷終有未逮往者該鎮工匠曾赴東瀛見其
詣力未深爽然若失即外洋各國亦自以為弗
如也至於征權則稅重而釐輕江西瓷釐不及
原價十分之一而洋關納稅則權其輕重別其

图3 光绪二十九年江西巡抚布政使柯逢时《开办景德镇瓷器公司》奏折

“奏明改归商办，由侯选道曾铸等与上海道瑞澂商同担任发起，定名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议集股本二十万元，每股五元，由发起人分认一万五千股。”虽名为商办，实则仍是官商合办。聘请祁门贡生康达主持公司业务。公司在景德镇龙珠阁北彭家弄口，面对中华路新建了一幢房屋，作为办公和门店使用。西南有彭家弄、东司岭等厂房和柴窑，东北有薛家坞、罗汉肚厂房和柴窑。并招募流散艺人，启用御窑厂的原有作坊，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造高档细瓷。有坯作、窑作、彩作三个部门，每四日出窑一次，规模不是很大。同时在鄱阳设一分厂，以便实验改良制瓷。之所以在鄱阳设分厂，皆因景德镇瓷业因循守旧之势力强盛。黄炎培在《考察教育日记》中指出：“景德镇之制瓷者，已则守成法不可改，而复怵于一经改良，将立被淘汰，而无所啖饭，势且出于合群抵制之一途，故迁地以避之。”由此可知景德镇瓷业僵化到何等地步。由于江西瓷业公司在设立时，先由清政府商部立案，准许援引海关则例，缴纳值百抽五的则例税，并在九江、汉口、上海等处设立发行所，加之又启用御窑厂作坊，故有称其为宣统官窑一

说。但此说大谬。特别是一些不明就理之人，见到民国早期署有“江西瓷业公司”款识的仿古旧物，皆称之为“宣统官窑”，更是谬上加谬。首先，宣统一朝不过三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才成立，以前不可能烧造所谓的宣统官窑瓷器。其次，江西瓷业公司为官商合办的企业，而非皇家机构。其三，康达主持公司业务，多少有些现代经理人的意思，而不是皇家的督陶官。所以，江西瓷业公司不是宣统官窑。那么，江西瓷业公司是否烧造过“宣统官窑”器物呢？肯定地讲，烧过。因《马关条约》之后，御窑厂已经名存实亡。而清代后期，皇家用瓷多为官搭民烧，此“搭”字为附上或依附之意，就是用御窑厂的坯胎，依附在民间窑户烧制，照章付给窑户柴火钱，其益处极为明显，虽然官窑瓷器不计成本，但烧窑时的位置直接决定瓷器的质量，自己烧窑难免会有好坏之别，而搭烧则选占最好的窑位，即温度高、黄爽倒塌出现较少的位置。按当时的柴窑习惯术语，叫拉前拉后和拉背二路的二、三、四脱。做为有官方背景的江西瓷业公司，同时又启用御窑厂原有作坊，烧造宣统官窑理应责无旁贷。但这里有一个界限，即凡是有宣统年号的或

可以视为江西瓷业公司烧造，因不能排除其它民窑搭烧的可能。而有“江西瓷业公司”款识的器物全都不是宣统官窑，因它的使用对象不是皇家。江西瓷业公司在成立之初，产品的制作和设计均沿袭旧法，器物和晚清官窑的器物没有大的差别，其中更有仿照官窑的样式，这也是一些人视其为宣统官窑的一个原因。

由于江西瓷业公司的性质，辛亥革命后各地接管清廷财产，江西省当局派人员到镇查封江西瓷业公司。民国元年3月9日《申报》第六版载：“景德镇商务总会作电致赣垣云：瓷业公司是按照商律，以股份组织，定额招二十万元，瑞徽（清末巡抚）三万……。近蒙委韩昌委员来镇调查，将公司发封……。敝会用敢沥呈实情，仰恳察明，电飭委员，只需调查瑞徽实数，交由省议会议决，充作本省之公股……。同时启封，仍知照全体股东，协议以后维持办法……。”在景德镇商务总会的意见和要求下，江西瓷业公司方得以继续生产经营。

江西瓷业公司成立的目的是改良景德镇衰落的陶瓷工业，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五省协款的来源中断，原定计划中的40万元只筹措到20万元，无法购置机器设备，鄱阳的分厂还没有投产就倒闭了。江西瓷业公司虽然在清末的一二年间“业务蒸蒸日上，后因民元兴复，九江与汉口分销处以兵事影响，损失十余万金，以致元气大伤，残余资本，遂集注于景厂，而为局部之经营，此公司之大厄”（《景德镇陶业纪事》）。这种因时局造成的收缩，使江西瓷业公司由最初的改良瓷业的宗旨又回到了原路。即使是这样，也较清末有了一定的发展，“于艰难缔造之中，粗能立足。所有出品虽有旧法，悉仿新式，制作精良，几与前清之御窑媲美。南洋劝业会、巴拿马赛会均列优等奖牌，可以知其工作刷新矣”。特别是在1910年南洋创业会上，送展的各种瓷器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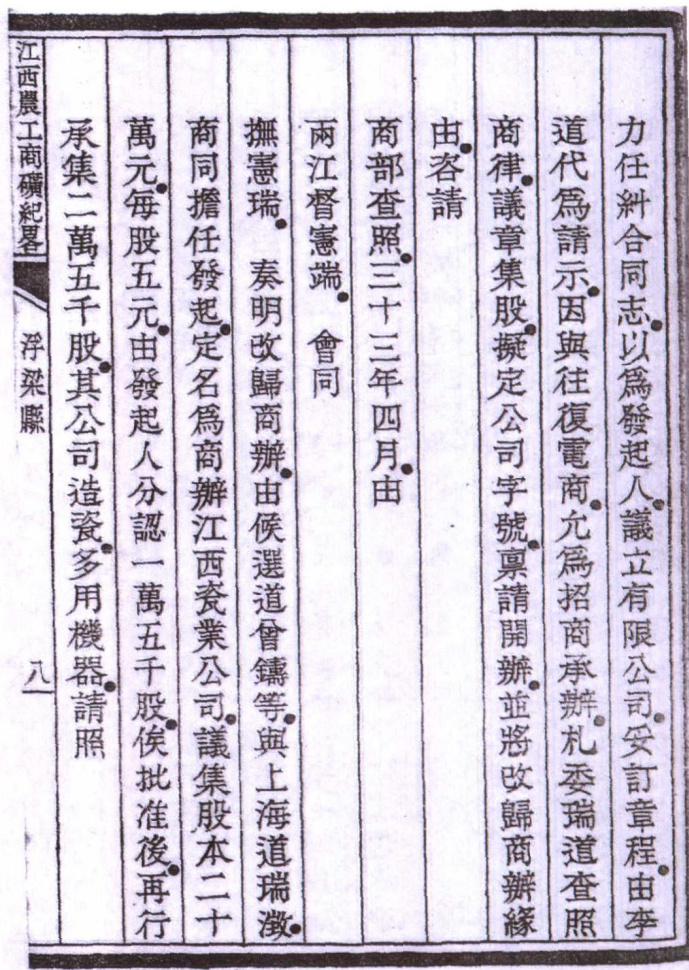


图4 光绪三十四年 《江西农工商矿纪略》

得最高奖项奏奖。由于江西瓷业公司在开办的头几年选料施工极为精细，产品质量较当时的其它厂店产品精良，“客商之求鬻踵门不绝，故常求过于供。”于是便在景德镇收购瓷器，在九江、汉口、上海三个经销店销售。虽然这一举措扩大了景德镇瓷器的销售量，但同时也使自己的产品生产和研发受到了影响，以至于一些人认为江西瓷业公司本身没有产品，只是贩卖景德镇瓷器，挂上公司招牌，以广招徕。其实这种观点是有些偏见的。

江西瓷业公司于清末成立，以改良瓷业为宗旨，但遗憾的是受时局多变的影响，并没有从手工业向半机械化、机械化转变。而清政府的倒台、北洋军阀在政治舞台上的谢幕，也使它失去了官商的“红顶”，由官僚资本企业逐步演变成了私人企业。在独领景德镇瓷业风骚近20年后也就默默无闻了。1950年春，江西瓷业公司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国营瓷厂—建国瓷厂。

二 不得天时，半途而废的 民族资产阶级瓷业改良

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民族工业沉沦的时期，特别是传统的手工制瓷业。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出现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手工制瓷业的发展方向。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帮会把持瓷业生产，有分工而不能合作，使景德镇瓷业生产举步维艰。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景德镇虽有窑烟囱百余座，出烟者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在民国早期的一段中，有窑户4 000余户，工人20余万，而此时窑户不过

千余，工人不到3万。瓷器出口由民国21年以前12.7万担降至7万担。做为世界瓷业发源地，我国第一产瓷名区的景德镇已岌岌可危。为了不忍民族工业的沉沦，为了拯救景德镇的瓷业，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于是就有了江西陶业管理局的设立及民族资本光大瓷业公司的筹备。

1925年景德镇曾设有江西陶务局，著名学者、教育家张浩曾任局长，同时在南昌设有工业试验所。1931年将景德镇的陶务局迁并南昌工业试验所。江西陶务局的业务范围及为何迁并的原因因史料的阙如而不详。但或许与当地官员和帮会有关。1934年，应全国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之邀，杜重远先生来到江西，并对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景德镇瓷业衰落的原因，纯系“地方政府之放任”所致，主张“首在设一陶政管理机关，隆其职位，大其事权，择一精于陶业又热心工人福利者，久于其位，遇事则直接处理，无待周折”。他在陶业人员养成所的一次讲话中，更明确说明，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必须是简任官职，也就是说要大于荐任的地方官，如浮梁县长。而且县长的人选，要由其引荐，这样才能有利于陶业管理工作。特别是杜重远以外省人无乡土观念，在上任之后，频出重拳打击景德镇瓷业百余年来不合时宜的陋规。

1935年12月上旬，江西省政府正式公布陶业管理局的组织大要及杜重远所拟的整理景德镇瓷业的计划草案，并委任杜重远为局长，管理局直接隶属于江西省政府，并受建设厅指导。为了保证陶业管理局的改良措施能在景德镇顺利推行，杜重远还向江西省政府推荐了一位知己阎模闾(南昌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阎宝航之兄)担任浮梁县长，以收“管政合一”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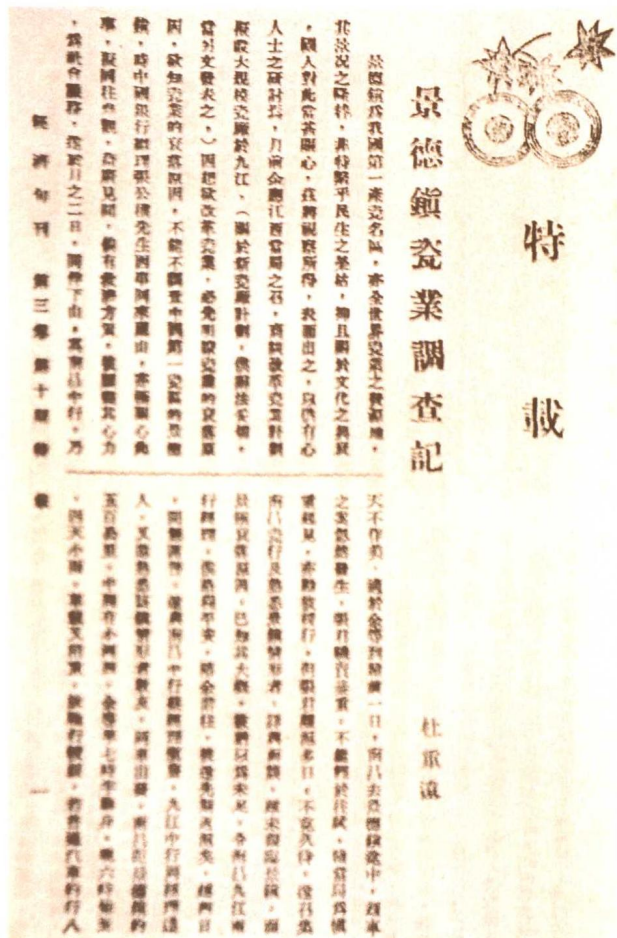


图5 杜重远《景德镇瓷业调查记》

江西陶业管理局成立之初，虽地方政府拨给了明、清时期的御窑厂旧址南段“厂前”和原陶务局及五龙庵办公用房，但因御窑厂年久失修，必须大规模进行整修和基建，故只好在陶务局旧址和五龙庵办公。

江西陶业管理局在杜重远的主持下，对整顿景德镇瓷业生产，复兴民族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取缔窑禁、取缔各项陈规陋习及限制窑身尺寸、取缔宾主制度、筹建原料精制厂、成立陶业人员养成所、筹建景瓷运销合作社等。并于1936年在原御窑厂左侧建立了一座占地面积约360平方米两层楼的瓷器陈列室，搜集了部分景德镇出产的瓷器，也有一小部分仿古瓷和国内外的瓷器。虽然所陈设的瓷器品种较少，很大部分也不能代表景德镇瓷器的水平，但是能有这样一个供人参观的场所，对于封闭的景德镇来说还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陈列馆全天开放，起到宣传景德镇瓷器、同行之间相互借鉴的作用。遗憾的是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景德镇进行轰炸，陈列的瓷器只好运往萍乡上埠镇存放，馆址则为敌机夷为平地。

在九江筹建江西光大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瓷厂），是江西陶业管理局在杜重远的主持下为改进和发展民族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景德镇瓷业生产方式落后，技术墨守成规，帮派的陋规陈习势力严重，对瓷业改革的阻力极大，尤其是交通闭塞的景德镇不适宜开办较大规模的工厂。之所以厂址定在九江，是因九江交通方便，原料来源好解决，更无景德镇的恶习干扰。厂址定在九江东门内大中路圣公会旧址。1936年12月28日，在上海召开创立会，通过以振兴中国瓷业为宗旨的章程，推选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董事长，董事除江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龚学遂、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吴健陶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卢作孚、黄炎培等政府要人和工商界名人，杜重远任总经理。公司资本总额为国币

100万元，分为2万股，每股50元。江西省政府投资20万元，其余80万元由杜重远招集民股（限本国国民）。至此，一个来头较清末的康达更大、振兴国瓷的雄心更雄伟的官商合办的民族资本瓷业公司开始了运作。但命运却同他们开了个玩笑，其结局比康达还要惨。

1937年春，九江瓷厂的全部厂房、员工宿舍竣工。八月底，全部机械设备安装完毕。正在准备试产时，抗日战争节节失利。不久，南京失守，九江也面临沦陷，只好立即进行拆迁。关于九江瓷厂搬迁一事有不同说法，一说九江沦陷之后，公司全部房屋和机器设备为日本侵略者所攫取，将机器全部拆除，堆存于九江市警察局内，六座窑亦拆掉，全部厂房作日军伤兵医院。一说能运走的都装船运往长沙，两只大木船未到武汉就沉没于长江了。个中详情还有待史料发掘。但不论怎么说，九江瓷业公司在没有一碟一碗问世的情况下夭折了。民族资产阶级改良瓷业的泡沫破灭了。

而江西陶业管理局在经历了1934—1935年全盛期，1936—1937年的维持期，1938年杜重远离去的名存实亡期后，于1939年初，江西省当局明令裁撤管理局。至此，江西陶业管理局告终了。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振兴瓷业又成为制瓷业同人的话题，1946年10月24日，汪璠、汤有光、潘庸秉、张浩、饶华阶、刘雨岑等人曾就瓷业问题召开座谈会，研究设立国窑厂问题，据史料记载：“依照汪校长计划，需经费十五亿元始可成立，恐中央一时不能拨此巨款，惟该项计划可交设计委员会再加研究，以备提供中央采择，兹为求其实现，可兼筹并顾，暂作如下决定：1、性质，以研究、实业二者并行；2、技术，注重改良，达到机械示范化；3、出品，注重精致艺术品及大众应用品。”然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这一计划也就不了了知了。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民族资产阶级由改良景德镇瓷业入手，画了一个又大又圆的圈，终又回到了手工操作的起点上。

三 三足鼎立的徽、都、杂帮与轮流坐庄的商会

历史上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五方杂居，商贾云集，故又有“千猪万米”之谓。因此各种帮会社祠相继出现，对景德镇瓷业及工商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民国时期在景德镇最有影响的是徽帮、都帮和杂帮。徽帮由徽州人组成，旧徽州有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绩溪。据民国26年《江西统计月报》载：景德镇的十里长街上有店铺1 221家，其中70%以上为徽州人开设，垄断了景德镇商业和金融业，人数当以万计，可谓人多势众。都帮的人员较为单一，均为都昌人士，他们垄断了景德镇瓷业中的圆器业和烧窑业，其势力与经济实力远在徽帮之上。杂帮的人数地域最广，经营的行

业也杂，凡都、徽两帮不经营的琢器制瓷业、红店，与瓷业相关的服务行业等均由其经营。从业人员最多，但经济实力及势力均不及徽、都二帮。

徽帮在景德镇的特点是利用乡党力量和宗法势力，控制着镇上绝大部分行业，排斥市场竞争，不容外籍人插足。象绸布业，均为清一色的黟县人，有几家南昌人开的布店只能经营土布和夏布。徽帮在景德镇经营的业务主要有：钱庄业、典当业、银楼业、绸布业、药业、百货业、酱园业、南货业、油盐业、印刷业、粮食业、纸竹爆、黄烟业、茶叶业、饮食业、五洋业及陶瓷颜料业、瓷土业、杉木业、窑柴等20多个行业。徽人何时进入景德镇已不可考，但据有关志书、族谱记载：明末祁门



图6 福建会馆一角



图7 景德镇商会旧址

人潘辄便成为“徽州瓷商侩首”，侩为说合买卖之间的价钱以成交的中间人；歙县人潘次君“贾昌江，居陶器，统一瓷器价格，赈济陶家”；婺源人洪宗旷“侨居景德镇，理陶业，尝舟载瓷往外江”。到了清代，徽人在景德镇的经营进一步扩大。民国时期，徽帮中人才济济，江西瓷业公司经理康达即为安徽祁门人士。而在陶瓷界大名鼎鼎的饶华阶也是祁门人，由于其精明强干，具有先进的瓷业理念，曾被杜重远聘为示范瓷厂的经理，杜重远的许多陶瓷改革措施均为饶氏提出，并逐步采纳和利用。而陶瓷美术家中更是高手林立，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张志汤、汪大沧等均为徽州人士。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徽帮生产的瓷器曾获超等奖，而仿清康熙的瓷器亦获得优等奖。可以这样讲，徽州人士为景德镇瓷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徽人为了加强团结，联络同乡防止异乡人的欺凌，徽州各县相继以县为单位建起同乡会，并公推会首，对外进行活动。随着徽州人来景经商的增多及同乡会的建立，徽州人利用地缘关系，结成了徽帮。参加徽帮活动的先是徽州一府六县，后来皖南的泾县、太平、宁国等县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联盟。并于清嘉庆年间（另说道光年间）在前街（今景德镇市中山路第一小学）建立了徽州会馆，会馆占地面积4 052平方米，富丽堂皇，居景德镇30多个会馆之首。徽州各县会首，每年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徽州会馆内的“文昌宫”进行活动，共同处理对内对外事宜。如前所述，徽帮为景德镇瓷业作出了贡献，但帮会的陈规陋习也阻碍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由于徽帮较少从事瓷业，所以这种阻碍不及都、杂二帮明显。

都昌人在景德镇瓷业上的垄断地位，在清代就已经形成，都昌人何时来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已不可考，但从一些史料记载来看，最迟不过明代。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饶州七县的陶工曾联合起来要赶走一个都昌籍窑户，由此可知，至迟在明万历年间，都昌人不仅在景德镇从事瓷业生产，而且已经当上了窑户。都昌人在景德镇站住脚后，也组织起了自己的金兰社，制定约章，保护自己，对抗异己。并于明末清初在今风景路兴建了

都昌会馆，当时名为古南书院，现为人民瓷厂仓库。都帮在清末民初聚集着都昌籍大中小窑户千余家，控制了整个烧窑业和圆器业，在瓷业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垄断。虽然景德镇在民初已经形成都、徽、杂三帮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论人多势众，实力强大，仍以都帮为首。景德镇首设总商会时，有首批会员41名，而都帮以一县之地就占有14个名额，居1/3还强。都帮为景德镇的瓷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出的瓷业名人不逊于徽帮，如旧时景德镇俗称的三尊大佛中的余英涇、余旺青均为都昌人士，另一大佛何志凌为徽州人，但不经营瓷业。四大金刚中的冯承就、余略盛亦为都昌人士，另两位金刚一为徽州，一为乐平人士，均不从事瓷业。十八罗汉中有十位罗汉为都昌人士，另八位罗汉中，仅有三位从事瓷业，一为抚州人，一为广东瓷商，一为湖北瓷商。景德镇商会的第三任会长陈庚昌及陶庆窑总老板余用正亦为都昌人士。而徐良俊、陈青山、巢克谦、余昭华、刘经诒、刘经荣、刘万安等均为当时的名家名号。不可否认的是，都



图8 改建宁绍别墅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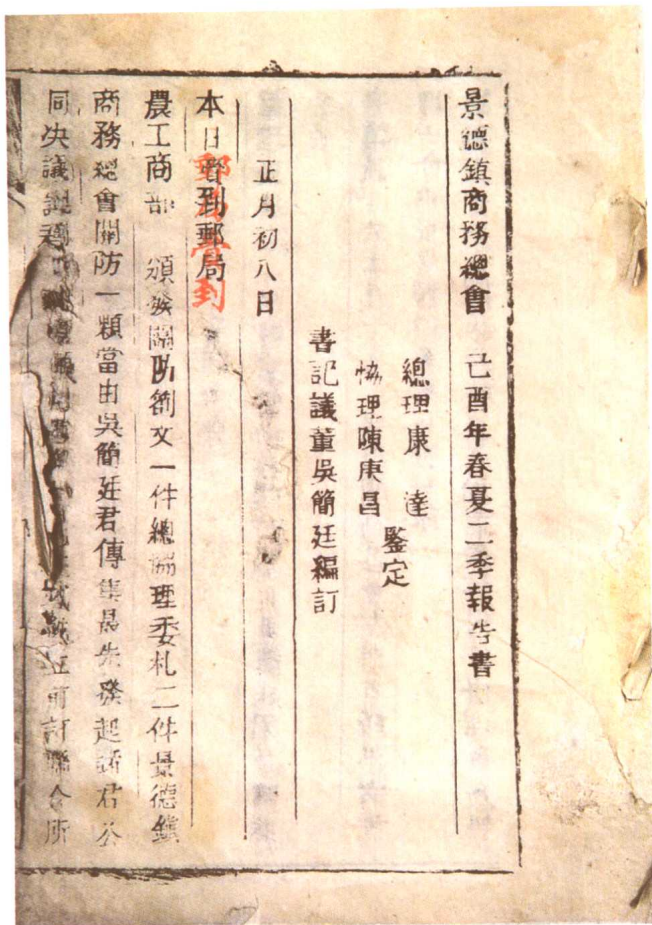


图9 宣统元年 《景德镇商务总会己酉年报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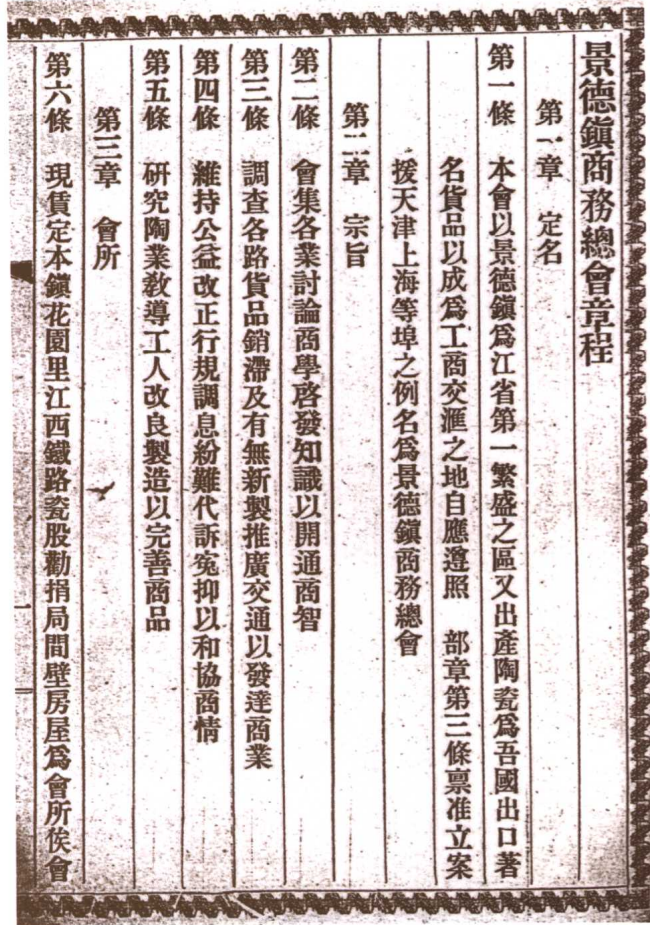


图10 宣统元年 《景德镇商务总会章程》

帮在长期的瓷业垄断过程中，严重阻碍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陈规陋习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改进，而成为杜重远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后第一个打击对象。

杂帮的人员构成最为复杂，从业人员也最多，所经营的行业均为徽、都二帮以外的行业。杂帮进入景德镇的时间已不可考，其名称的由来不晚于清中期。清代前半期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瓷业的高度发展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尤其各地在景德镇同乡会的建立，使景德镇的各大行业逐步形成垄断。当时的浮梁县支应局为了便于征收捐税，将徽商垄断的主要商业和金融业、都帮垄断的圆器和烧窑业之外的大小行业称之为杂帮。杂帮虽人员最多，但因地域分散，故在三大帮中势力最弱。杂帮主要包括抚州帮、南昌帮、丰城帮、吉安帮、奉新帮、饶州帮、安仁帮及各地旅景瓷商等26帮。杂帮对景德镇瓷业所做

的贡献丝毫不逊于徽、都二帮，就有影响的陶人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绘瓷及雕瓷艺人有新建人王琦、黎勉亭，乐平人汪野亭、程意亭，余干人邓碧珊，南昌人徐仲南，丰城人王步、曾龙升、徐顺元，绍兴人田鹤仙，福建人游长子。推动工艺进步的广东人吴霭生，研究传统名贵色釉的广东人李之衡（祭红釉）、临川人鄢儒珍（乌金釉）、临川人李其才（钧红釉）、丰城人孙虹元（宋钧花釉）等。陶瓷教育家则有新建人张浩，宜丰人邹如圭，浮梁人冯渊、方大瀛，乐平人汪璠。编译家鄱阳人江思清，临川人吴仁敬，金溪人戴亮侪等。更有梁美兴琢器厂、艾荣生瓷号、天佑华瓷业公司、杨福盛瓷厂及众多的红店。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杂帮，景德镇民国瓷业不知要逊色多少。

景德镇的三大帮之间合作少而拆台多，相互勾心斗角。徽帮以主要商业及金融业为主，控制了景德镇经济命脉，但势力却不是最强。据老艺人回

忆，有一年闹粮荒，徽商乘机涨价，都帮群起而攻之，瓷工上街打米店，将米店打得一塌糊涂。又某一年，杂帮中的抚州帮做会，拟扎一抬阁上市，以示显赫。都帮闻之，欲打掉抚帮的威风，借口内有一抬阁扎了“老虎吃猪”的戏，含有抚（虎）吃都（猪）之意，当即聚众堵在御窑厂前，并在抚人火铳的硝桶内投以香烟头，引起爆炸，炸伤多人。军警调停下叫抚帮撤下那架抬阁，但都帮仍不答应，最终抚帮只好停锣息鼓，由此可见都帮之威风。由于都帮控制了景德镇的烧窑业，徽帮较少从事瓷业生产，故此二帮矛盾不大。而杂帮没窑，必须搭都帮的窑烧坯，因此矛盾较为突出。都帮人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垄断优势，或无好位，或高收费，或不定期烧窑使杂帮之人苦不堪言。

为了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以和谐商情，同时也为了巩固三帮业已形成的垄断地位，1910由三帮共同组成了景德镇商务总会。景德镇在1900年时有浮梁县商会，为浮梁县知事统辖，日常事务是料理地方公益，也兼问商务，但既不能协调三帮的关系，又不能开拓对外贸易。所以，景德镇商务总会的成立是顺理成章的。发起人为徽帮代表康达、都帮会首陈仲西、杂帮会首吴简廷。1910年初清廷正式批准成立景德镇商务总会，康达为总理，陈庚昌为协理，议董12人，有都帮会员14人，徽帮会员15人，杂帮会员12人。会址在花园里。当时的章程对选举总理协理是这样规定的：“（甲）总理协理在议董内公同选举。（乙）选举总协理之法，亦与选举人员同，以得票多者为总理，次为协理。若票数相等，即由议董等当场再行投票公推。（丙）总协理举定后，均应禀请农工商部加扎委用，以一年为期满，届期另举，或连任，均以投筒得票为限，惟续任只一年为限，不得再续……”景德镇商务总会历经40余年直到解放，其名称几经变化，其章程亦几经修订，主持人几经更迭，但主持人均由徽、都、杂三帮头面人物把持。虽然在章程中无轮流坐庄之条款，但实际上确实如此。

1910年商会成立时的总理为徽帮祁门人康达，任职到1911年。另有说其连任几次，但此说不确

切。第二任改名为景德镇商务总会，会长为杂帮鄱阳人吴简廷，此时章程改为有副会长二人，会董16人，每届任期4年。其任职到1920年。1921年复称为景德镇总商会的第三任会长为都帮陈庚昌，1924年任满交职。继任者为徽帮婺源人张启东，任职没有届满。1926年11月改称为景德镇商民协会的主任委员为杂帮丰城人陈铭珍，任期亦没届满。1928年起复称景德镇总商会的会长为徽帮休宁人吴少樵，任职不及3年。在吴少樵前后，有都昌人曹星垣任会长。1930年由都帮人陈庚昌接任。1931年陈庚昌卸任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两个商会性质的组织，一为徽帮婺源人施维明任主事人的景德镇商会临时维持会；一为都帮人王学乾任主事人的景德镇商会整理委员会。1932年徽帮的吴少樵再任景德镇商会主持人。从1933年起徽帮的施维明主持商会（1941年改称浮梁县商会）达10余年。1945年由杂帮临川人赖清任理事长，而最后一任主持人为杂帮的范一峰，任职不足一个月。从上述任职情况来看，徽帮先后有7人次主持商会，时间几达20年；都帮有4人次主持商会，时间为6年；杂帮有4人次主持商会，时间为14年。徽帮无论是在人员上还是在时间上均处于优势。但从成立的头20年来看，明显是轮流坐庄。再从主持人的职业上看，从事瓷业的占大多数，任职的时间也最长。

景德镇商会组织在抗战之前有一定的积极表现，如1919年参加各公法团体组成的国货维持会，动员各洋货店遵守有关规定；1924年组成“五卅”后援会；1930年为红军筹措100多万大洋军饷；1931年通告各行业遵守“抵制仇货、维护国货”的有关规定；1937年为前方将士伤员和难民募捐。同时对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如1923年接受瓷业工人增加工资以改善生活状况的要求，使景德镇瓷业创过去年产量最高。但由于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推动瓷业进步，这个工商业组织逐渐成了徽、都、杂三帮争名夺利、讨价还价的场所。1949年6月4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原浮梁县商会改为景德镇市工商业联合会，结束了三帮头面人物把持商会的现象。